

## 绪 论

# 日本文明的研究课题

文明的定义，是指人类在生活 and 劳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特别是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学术、宗教和艺术的成果，并由此提升而凝聚成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文化思想的统一体。

人类活动创造了文明，文明的成果又推动了人类活动的发展。由于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不同的文化景观和不同的宗教文化形态之中，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学术、宗教和艺术，并在相互交流中自然地逐渐形成了世界分属东西方的两大文明体系——东方文明渊源于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西方文明渊源于希腊的古代文明——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史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根植于本国、本地区、本民族赖以生活的自然、风土和人情之中，是自己自发育成的；同时又是在与 他国、他地区、他民族的文明的交流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明。作为世界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日本文明，也是沿着这一历史轨迹形成与发展，这是自不待言的。

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同属东方文明体系。在历史上，日本古代文明受到东方的大陆古代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甚大，近现代文明则接受了西方异质的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这种日本文明的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鲜见的。但是，不能认为日

本文明是外来的文明，是汉化的文明或欧化的文明。应该说，日本原初的文明仍然是自发生成的文明，而且经过历史的洗练和提升，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质。原始神道就是在日本岛国的自然风土中培育出其“自然本位”和“现实本位”的本土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孕育出本土原初的色彩观和自然观——原始审美意识的萌芽。这一本土思想的原质成为孕育日本文明的河床。其后产生的原始的咒语、歌谣、祝词、神话、传说中所表现的言灵思想，也无不是根植于日本本土固有的神道信仰。

日本本土原始文明成因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就是国民性格形成，对于文明的自发产生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同一民族生活在同一的自然风土、社会条件和宗教文化形态下，这些相同的诸因素作用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会铸造出其相同的基本性格。基本的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对其民族的实际生活乃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未分化为阶级之前，这种相同的民族性格特征，自然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文明形成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民族性格是形成日本文明特征的基础，反过来日本文明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反映。

由此而产生的日本文明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并成为引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明的根基。

因此，我们研究日本文明，首先要研究存在于日本民族在生活实践中自力创造的宗教、艺术和学术的成果，以及由这些成果凝聚而成的起伏流动的文明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的文明精神，在日本文明发展史和对外文明交流史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其次要研究日本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冲突与调和中，消化和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秀分子，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文明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研究日本文明在内外因素的历史联系中，其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体性。这两者是研究日本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

古代日本引进中国文明经过近千年的消化过程，至平安时代才完成了本土化。同时还不断地继续引进又不断地继续消化。从神佛融合、儒学朱子学日本化，到老庄思想变种、禅宗世俗化等等构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艺术精神到审美意识的主体性的坚持，到创造独特的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比如文学方面的和歌、物语、俳句、浮世草子等；戏曲方面的谣曲、狂言、能乐、净琉璃、歌舞伎等；绘画方面的大和绘、浮世绘等，都是在自己民族的风土中创造出来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财富。

明治维新以后近百余年，经过了两次文明开化，吸收西方文明至今仍处在不断消化的过程，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任务。近代的自我从确立到丧失，又艰难地再确立，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如此，它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已经发挥并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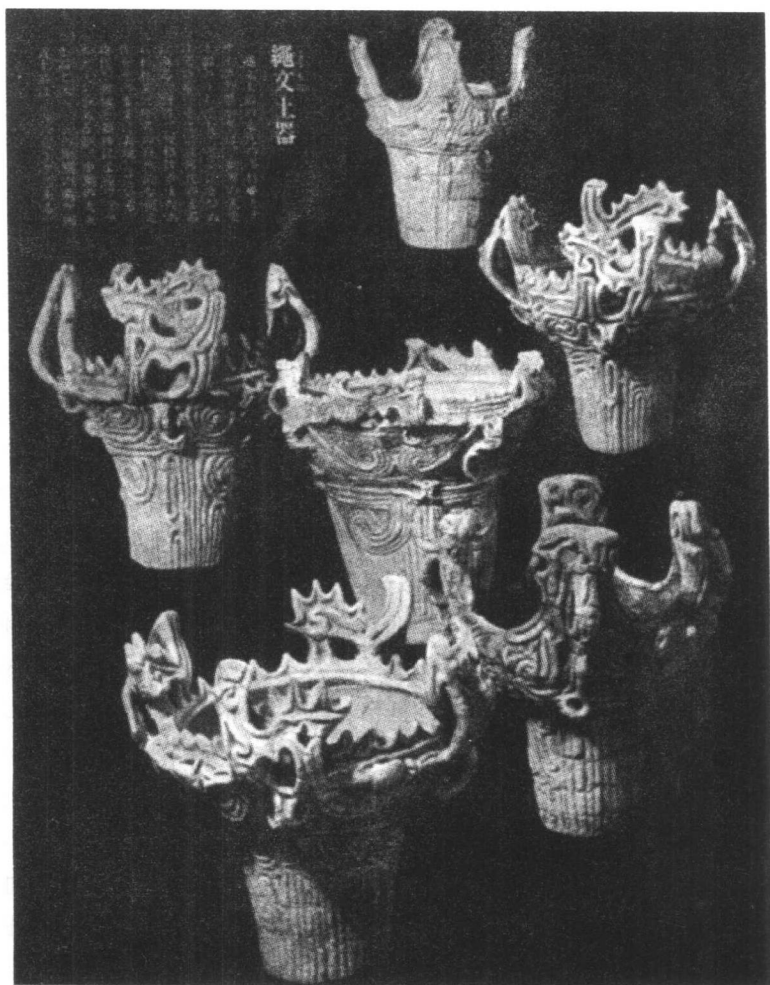
当然，日本与外来文明——无论是与古代的中国文明或近现代的西方文明的交流中，从冲突到调和的过程反复交替地出现过“汉风化”、“欧化主义”的风潮和“国粹主义”的风潮，而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两种风潮的反复出现的周期，古代长些，近现代短些；其广度和深度也不尽相同。不过，日本文明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摆脱了两种将某一种文明绝对化的极端倾向，建立以“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为导向的、与外来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发展机制，在坚持外在交流的主体性的情况下，保持两者的平衡而达到融合。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对两种不同特征的文明都有自觉认识的基础上，彼此取长补短才能完成。

日本文明创造性的发展，坚持了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本土文明的主体作用；一是坚持多层次引进及消化外来文明。可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日本文明如此热烈执着本土文明的传统，又如此广泛摄取外来的文明；如此曲折的反复，又如此艺术地调适和保持两者的平衡，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

质的新的文明体系。我们研究日本文明，力求透过日本文明发展的史实及其表现出来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从整体上把握日本文明发展的关键问题，即把握对上述两个基本点的坚持中出现的碰撞与冲突、调适与融合的积极内容，并在这个基础上阐明东西方文明体系间发生碰撞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和最终将走向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汇与融合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是世界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

正如李大钊早就指出的：“自间固有之文化大抵因某民族之特质与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焉必于是等文化不认其中之一为绝对，悉摄容之而与以一定之位置与关系始有产生将来新文化之资格。若而民族于欧则有德意志，于亚则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别创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综合从来之一切文化之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处。（中略）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两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绍疏通之责亦断断非一二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日本文明这一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值得总结和借鉴。



1 土器，绳文时代的各种变化多样的土器

## 第一章

# 风土 · 语言 · 民族性与文明

###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 19 世纪 80 年代，解剖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人，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之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问的。考古学已证明在 10 万年乃至 20 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sup>①</sup> 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 1957 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古人”（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滨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 3 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 18000 年，男性身高约 155 厘米，女性约 144 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 1 万年前到公元前 3 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千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

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 年，九州大学教授金关丈夫

<sup>①</sup> 1931 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于更晚的“新人”阶段。

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 200 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 162—163 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sup>①</sup>而持“混血说”的学者，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计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sup>②</sup>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

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1版，第96页。

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日本，且继续向东日本和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语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可能成为日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宾语—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语）可能是从共同祖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于西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

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 5 个,即あ(a)い(i)う(u)え(e)お(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语视为“混合语”即日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古代日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初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语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语。

日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和中期（约为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

《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 57 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 1784 年 2 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 2.3 厘米、厚 0.8 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 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 年）、“广陵王玺”（1981 年）、“文帝行玺”（1983 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了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都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已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

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sup>①</sup>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并立的状况。

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治状况。邪马台国约存在于公元 2 世纪初至公元 3 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 21 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家，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sup>②</sup> 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

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5—12 页。

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 266 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 421 年）赐诏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情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枝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 414 年的高句丽好太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 5 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大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 5 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都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 13 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顺帝开明二年（公元 478 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

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 7 世纪以后的事。7 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 645 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 二、风土与原始宗教思想

关于风土，从狭义来说，是指自然环境，如山川湖海、气候等。从广义来说，还包括民俗即所谓的“人情”。这里所说的“风土”是狭义的。风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它所负载的人群的文明成熟度及其特质。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侧，是呈弧形排列的岛国，南北长约 3000 公里。除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这四个主要岛屿外，其周围还散布 4000 余小岛。

日本多山，国土的 67% 是山地，大都被森林覆盖。主要山脉飞驒山、木曾山、赤石山，平均海拔 3000 米，纵贯本州岛中央，将其分为东向太平洋的“表日本”和西临日本海的“里日本”。因而，日本的平原少，河流短，地形复杂而富于变化。然而，日本这种地形的形成是较晚的，大约是在 90 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的造

山运动以后的事。日本的活火山多，地震多，或许与此有关。

由于日本列岛呈南北方向的弧形排列，地处北纬 45 度至北纬 24 度之间，其气候便有亚热带、温带与亚寒带的区别。加之，复杂地形与海流的影响，日本气候的地域差异也很显著。但是，大体上说，日本的气候受亚洲季风影响，是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其气候的特征是降水量大，既多雨，又多雪。日本列岛的年平均降水量为 1700 毫米，而作为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西亚，其年平均降水量仅在 500 毫米以下，近代文明发祥地西欧的年平均降水量则在 1000 毫米以下。与同处东亚的北京（年平均降水量 600 毫米）南京（1000 毫米）韩国的大邱（950 毫米）相比，其降水量亦遥遥领先。在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太平洋一侧的日本，雨量较集中，6—7 月是高温、多雨的梅雨季节，8 月以后台风则经常带来暴雨。在冬季，日本海一侧，由于位居对马暖流（海面水温即便在冬季也可达 5—10 度）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高气压的交汇处，成为世界上降雪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例如新潟县一带经常积雪 4—5 米。

降水量大便于有利于树木成长。因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约占国土的 2/3。加之日本列岛纵贯几个气候带，所以，日本具有富于多样性的森林生态体系。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明具有“森林文明”的特色。

日本四周环海，而且在日本近海生息的动物种类亦很多。例如，地中海仅有海生动物 1322 种，日本近海则多达 3492 种。<sup>①</sup>海洋不仅为日本人提供了丰饶的食物来源，而且一直作为内外航路而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有时还会发挥保卫日本民族与日本文明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明

安田喜宪：《列岛的自然环境》，《日本通史》第 1 卷，岩波书店 1993 年第 1 版，第 52 页。

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

然而，我们现在所见的上述日本风土，并非古来如此。其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

一般认为，自 200 万年前开始至约 1 万年前为止，地球处于冰河时代。冰河时代又可分为若干气候严寒、冰河发达的“冰期”和气候较温暖、冰河后退的“间冰期”，“冰期”与“间冰期”反复交替。在严寒的“冰期”，冰河覆盖了陆地的 30% 左右，海面亦下降。在冰河时代，日本列岛的年平均温度，均比现在低 6 度左右。那时的海面降低，称为“海退”，要比现在的面低 100 米以上。当时有陆桥将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相连结。冰河时代的最后一个“冰期”大约始自 7 万年前，其最寒冷的时期为 25000 年前至 15000 年前。当时的日本海被对马陆桥隔断，几乎成为湖泊。由于对马暖流不能北上，以致降雪减少，日本的气候寒冷而干燥，应属于大陆性气候。不过，依据花粉的考古学调查可知，当时日本的森林却比西亚和欧洲繁茂，在东日本多为针叶林，而在西日本则多为落叶阔叶林。当时的日本人虽也使用石刀型石器猎取古象、大角鹿等哺乳类动物作为食物，但更多地依靠采集森林中的树果（如橡、榛、核桃、栗）等植物性食品维持生活。

自 15000 年前开始，气候逐渐转暖。到了 13000 年前，降水量亦开始增多。与之相适应，在日本海一侧的多雪地区的森林中（主要在北纬 40 度以南地区），山毛榉、柞之类的温带落叶阔叶树逐渐增加。气候和植物生态体系的如此变化，不利于古象和大角鹿等生活于草原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生息。这时的日本人遂改用尖头石器，以捕获森林中的小型哺乳动物作为食物，并开始捕捉湖沼河川中的鱼类（如鲑、鳟），作为蛋白食品的新来源。人们已开始制造陶器，用于炊煮树果、山菜和肉类。日本人的生活越来越依存于森林的动植物资源，日本的森林文明由此而诞生。

大约 1 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全球的气候急速转暖。短短

的 50 年间，年平均温度升高了 7 度。海面亦急剧上升，陆桥消失，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被大海隔绝。<sup>①</sup> 日本人开始向大海寻求食物来源，用鱼叉、鱼钩等用具，捕捞鱼、贝类海生动物。在沿海地带遗留至今的许多贝冢，便是当年日本人食用海生动物的生动写照。日本的海洋文明由此而发生。

大约 8000 年前，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日本列岛多雨、多雪的海洋性气候至此才稳定形成。随之温带落叶阔叶林逐渐扩散到北纬 40 度以北，于是，关东地区及其以北多为落叶阔叶林，关西地区及其以西多为常绿阔叶林的日本森林生态系统也大体完成。因而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见的日本风土，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与同一时期的西亚大草原相比较，日本的风土更适宜人们生活，更容易获得食物。那时的日本人，春季采集山菜，夏季捕捞鱼贝，秋季采集树果，冬季捕猎野猪和鹿。年年如此，周而复始。人们劳动与生活的循环频率，与温带森林的季节性循环频率相互吻合，可谓人依存于自然，人与自然共生。

诚然，冰河时代结束后，地球的气候亦并非没有变化。大约 5000 年前，气候曾变冷。在西亚地区，气候干燥，草原沙漠化。于是，草原游牧民逐渐向水源较丰富的河滩地区集中。农民和牧民混合、集中，促成了城市文明的诞生。同一时期的日本，气候虽变寒冷，也出现“海退”现象，但仍湿润。在日本中部的八岳山麓和关东平原的西部，柞树林和桑树林依然繁茂。虽有部分日本人离开海岸地区，逐渐向上述内陆地区移动，但他们的生活仍然依存于森林，仰赖自然的恩惠，并未产生农耕或城市文明。这样的生活又延续了 2000 多年左右。

要追溯尚无文字记载时代的人们在这样的风土中生活所产生的原始宗教思想，实非易事。我们只有依靠有限的考古发掘品来

安田喜宪前引文、《日本通史》第 1 卷，岩波书店 1993 年第 1 版，第 67 页